

編者說明

自党中央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以后，讀者提出了一些問題，我們从中選擇了几个，分別約請了几位同志，写了 6 篇文章，編成此書。

本書的讀者对象主要是一般干部，其他讀者也可参考。

1957年 8 月

目 录

兩类社会矛盾的区别与轉化	周原冰(1)
人民内部矛盾在我国当前	
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根本原因	凌雨軒(15)
談人民内部矛盾的長期性	
和今天強調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性	雪 之(26)
正視和揭露人民内部矛盾的积极意义	馬俊芝(38)
談談“团結——批評——团結”的方針	胡少鳴(45)
关于人民内部矛盾和反右派斗争	陈 原(54)

兩类社会矛盾的区别与轉化

周 原 冰

我想談談下面三个問題：(一)什么是敌我矛盾,什么是人民内部矛盾；(二)敌我矛盾同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質与区别；(三)敌我矛盾同人民内部矛盾的轉化。

提出这三个問題来談,是因为許多同志在学习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的講演时,对这些問題还不太清楚,我的理解也未必妥当,只希望供同志們在学习时参考。

一 什么是敌我矛盾,什么是人民内部矛盾?

敌我矛盾同人民内部矛盾,是兩类社会矛盾。

称为敌我矛盾或者称为人民内部矛盾,都是从人民的立場来提出問題的。反对人民的一方称为“敌”,人民的一方称为“我”。人民的敌人同人民之間的矛盾,就是敌我矛盾。敌我矛盾双方中的我之一方,就是人民,所以,人民内部矛盾也就是敌我双方矛盾中“我”之一方的内部矛盾。

从来沒有抽象的敌我,只有具体的敌我;因而从来也沒有抽象的人民,只有具体的人民。人民的立場,就是按照历史发展的方向,推动社会前进的立場。所謂敌、我,必須站在一定的具体的人民立場上来划分,才会有意义。

抗日戰爭時期，日本帝國主義、漢奸、親日派是為敵之一方；一切抗日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是為我之一方。我之一方的內部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間的矛盾，統屬於人民內部的矛盾。這是從抗日的立場，亦即以站在抗日人民的一方還是站在日本帝國主義的一方，來劃分敵我的。在解放戰爭時期，美帝國主義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資產階級、地主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动派，都是敵之一方；一切反對這些敵人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是為我之一方。而我之一方內的各階級、階層間的矛盾，統屬於人民內部矛盾。這是站在民主革命的立場，亦即站在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義的立場，來劃分敵我的。在現階段，在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一切反抗社會主義革命和敵視、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社會勢力和社會集團，皆屬敵之一方；一切贊成、擁護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均系我之一方。這又是站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立場，來劃分敵我的。而一切贊成、擁護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間的矛盾，都屬於人民內部矛盾的範圍之內。不能夠一方面承認矛盾着的雙方都是人民，另一方面卻又否認它們之間的矛盾屬於人民內部矛盾的範圍，不能離開一定的具體立場來隨意劃分敵我，也不能離開一定的具體立場來隨意確定什麼矛盾屬於人民內部矛盾。

工人階級同資產階級間的矛盾，應當具體分析。

從勞動者反對壓迫、反對剝削的立場來說，資產階級是不事生產的剝削階級，工人階級是從事生產的被剝削階級，兩者間的矛盾，本應該是敵我之間的矛盾。但是，我國的民族資產

階級同工人階級間的矛盾，却出現了特殊的情況，從而表現為特殊的性質。

解放前的中國原本是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家，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不僅是全國勞動人民的敵人，而且直接、間接損害着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於是，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便成為全國人民（包括工人階級同資產階級在內）在這一歷史時期的共同的最高利益，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義，代表着這一時期中國歷史的前進方向。站在这个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義的立場上，我國工人階級同民族資產階級才同屬於“我”之一方，兩者之間的矛盾也才算作人民內部的矛盾（1927年4月以後，民族資產階級曾一度追隨大買辦階級叛變革命，在這一段時期內，工人階級同民族資產階級間的鬥爭，自然不屬於人民內部的鬥爭，而屬於敵我間的鬥爭）。但是，工人階級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是要為建設社會主義掃除障礙，把中國變成社會主義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是要為發展資本主義掃清道路，把中國變成資本主義的中國。這兩條道路自始至終又是敵對的。

從全國大陸解放之日起，社會主義革命便成為現階段中國歷史的前進方向。凡是擁護這個方向和朝這個方向前進的，都屬於“我”之一方；凡阻礙或破壞向這個方向前進的，都屬於“敵”之一方。民族資產階級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對象，他們同工人階級間的矛盾，本應轉化為敵我矛盾，但是，解放以後，我們國家出現了新的情況，這就是中國的工人階級掌握了國家政權並且和農民結成了鞏固的聯盟。這個工人階級領導下的

国家，又掌握了国民经济的命脉，把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经济，转为社会主义的经济。这一客观的形势，以及其他国内外的有利于社会主义 不利于在中国 建立资本主义的形势，决定了我国的大势只能是趋向社会主义，而不能是趋向资本主义。我国民族资产阶级由于这种大势所趋，再加上他们本身的软弱性，在失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依靠后，在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正确政策下，瞻望前途，权衡得失，因而又产生了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正因为我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现阶段，有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面，所以，他们才继续算在人民之内，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才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间的阶级斗争，才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

离开具体的时间、地点、条件，离开当时、当地的具体的立场，离开每一历史时期的革命任务，抽象地笼统地来认识我国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性质，是一种非历史唯物主义的观念，从这种观点来认识问题，便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二 敌我矛盾同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与区别

敌我矛盾同人民内部矛盾，在性质上和形式上均有着根本的区别。划清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有助于我们在革命实践中辨明方向而不致误入迷途。

首先，敌我矛盾是一种外部的矛盾。矛盾双方的根本立场是完全对立的，矛盾的双方没有利害一致的共同基础。人民内部矛盾是敌我矛盾中“我”之一方本身的内部矛盾。矛盾

的双方,尽管相互間有多大的差异或对立,但首先,在反对敌人这一根本点是利害一致的,其次,在共同追求的長远的或某一历史时期的总目标方面,也是利害一致的。因而作为人民内部矛盾的双方或数方,必定相互間有某种根本利益一致的共同基础。

只就我国情况为例。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形成“敌”之一方;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形成“我”之一方。这双方之間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的一切作为,都是为了侵略、損害以至毁灭我們中华民族;而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則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汉奸和亲日派,保卫我們中华民族。这矛盾双方的根本立場、根本利益,都是完全对立的,沒有利害一致的共同基础。矛盾双方互以对方为攻击的对象,从而来达到自己一方的目的。如只就抗日的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而言,它們之間也有矛盾,但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保卫中华民族使其不致灭亡这一根本点上,形成了这一时期的利害一致的共同基础,因而他們之間的矛盾,不管严重到什么程度,只要这一共同基础尚未破坏,都还屬於抗日民族統一战綫内部的矛盾。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官僚資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作为“敌”之一方;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作为“我”之一方。这敌我双方也沒有利害一致的共同基础,而互以損害和消灭对方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一方的根本利益。如只就反对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而言,尽管它們之間也有矛盾,但由于大前提的

一致性，形成了共同基础，所以仍屬内部的矛盾——人民民主統一战綫内部的矛盾。在现阶段，在建設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視、破坏社会主义建設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一切贊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屬於人民的范围。一方要建設社会主义，另一方要反对以至破坏社会主义，因而从根本上講，是沒有利害一致的共同基础的。人民内部尽管也有矛盾，但在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設事业这一根本点上，形成了共同基础。章伯鈞、罗隆基、儲安平、章乃器以至彭文应、陈仁炳之流右派分子的叫囂和活动之所以具有敌我矛盾的性质，就是由于这些右派野心家們，在动摇着和破坏着作为今天中国人民这个概念的共同基础——建設社会主义的道路。

其次，正因为敌我矛盾是一种外部矛盾，矛盾双方的根本立場、根本利益是完全对立的，所以，敌我矛盾的斗争，一般來講，总是采取一种外部冲突的形式来进行的，这就成了敌我矛盾的一种屬性，这种屬性就是矛盾的对抗性。人民内部矛盾是一种内部矛盾，矛盾双方的根本立場、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或者基本一致的，所以，人民内部矛盾双方的斗争，通常是不采取外部冲突的形式来进行的，而是采取比較緩和的方法，亦即在不損害双方共同基础和服从双方共同基础的前提下，进行批評或者斗争。而不管是批評或者斗争，其結果，总要求达到双方共同基础的加强、巩固和发展的目的。这也成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屬性，这种屬性，就是矛盾的非对抗性。

所謂敌我矛盾是對抗性矛盾，人民内部矛盾一般是非對抗性矛盾，都是从其根本屬性來講的。至于具体問題，还应当

作具体分析。

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本属性虽然是非对抗的，但由于“人民”这个概念中往往包容了好些不同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这些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中，固然包括象工人、农民那样根本利益完全一致的阶级，也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包括了象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那样互相对立的阶级，而人民内部的阶级对立，就不能不决定人民内部也有对抗性矛盾。同时，由剥削阶级的特性所带来的坏思想、坏习惯，在各部分人民群众中所遗留的影响也深浅不同，大部分人固然只是思想作风的改造问题，不致形成对抗，但也会有个别的以至一小部分受剥削阶级思想影响特深的人，在改造不力的情况下，也会产生对抗的一面。因而，一经深入分析人民内部矛盾中的某一具体矛盾时，便会发现有許多千差万别的具体情况，迫使我們不能簡單化。

例如，我国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的性質，就是很复杂的。毛澤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的講演中說：“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这是因为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兩面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潤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願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正因为我国民族资产阶级有兩面性，所以，毛澤东同志在同一講演中指出：“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間說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我国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妥协性的一面，以及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潤、在意識形态上和社会主

义不能相容的一面，便使得我国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具有对抗性质。我国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时期的革命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又决定了我国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在如何进行民主革命及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等方面所产生的矛盾，具有非对抗的性质。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否认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的同时，也否认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间的矛盾，在非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对抗性的一面。他们总想把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间的矛盾，说成只是非对抗性的，从而来模糊工人阶级的意识。如果我们竟也认为人民内部矛盾只存在非对抗性矛盾，全部否认人民内部在特定条件下，也可能存在对抗性矛盾，而又承认资产阶级属于人民的内部，那就很难和这些右派分子的言论划清界限；如果我们一面承认资产阶级是人民的一部分，一面又说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的矛盾不是人民内部矛盾，而是敌我矛盾，那便在逻辑上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所以，正确看待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间的矛盾，应当根据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而不能把人民内部矛盾一般是非对抗性的这一共性僵化起来，否认一切具体环境、具体条件下的特殊情况。

三 敌我矛盾同人民内部矛盾的转化

敌我矛盾是一种外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即敌我矛盾中“我”之一方的内部矛盾，这两类矛盾的相互转化，实即敌、我双方之互相转化。这里面包含着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由“我”之一方转化为“敌”之一方，亦即由“我”之内部矛盾转化为

“敌”与“我”之間的外部矛盾；另一种情况是由“敌”之一方轉化为“我”之一方，亦即由“敌”与“我”間的外部矛盾轉化为“我”之内部矛盾。在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叛徒即系由“我”之一方轉化为“敌”之一方；敌方起义人員即系由“敌”之一方轉化为“我”之一方。

但是，兩类矛盾的“可能”轉化，并不等于“一定”轉化。是否終于轉化，决定于必要的条件是否形成和成熟。敌我矛盾的基本特点是：矛盾双方的根本利益、根本立場絕對不能相容，并且还互以消灭对方的根本利益，实现自己一方的根本利益为目的。由这一基本特点出发，又形成另一特点，即矛盾双方沒有利害一致的共同基础。因此，敌我矛盾双方的互相轉化，便有兩個先决的条件。第一个条件是矛盾双方中之一方，必須放弃自己原来的根本利益和根本立場，服从原来与自己为敌的一方的根本利益和根本立場。第二个条件是矛盾双方找到了新的根本利害一致的共同基础。

以我們党和国民党的关系为例，是最可以說明問題的。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实行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这三大政策同我們党当时所代表的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于是，我們党同国民党在这个共同基础上建立了統一战綫，同处于民主革命联盟中，同属于“我”之一方，而以帝国主义和北洋軍閥为“敌”之一方。

1927年以后，国民党轉到了与此相反的方面，成了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反动集团，从联俄、联共、扶助工农轉到反苏、反共、屠杀工农。于是，国民党便背弃了作为革命政党的根本利益和根本立場，而以帝国主义和北洋軍閥的根本利益

和根本立場，为自己的根本利益和根本立場。这样一来，国民党和我們党所代表的中国人民之間，就失去了利害一致的共同基础，从而国民党就由“我”之一方轉化为“敌”之一方。国民党和我們党所代表的中国人民之間的矛盾，便由民主革命联盟內部的矛盾，轉化为敌我之間的外部矛盾了。

此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发展到有灭亡全中国的危險，不仅工人、农民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烈要求，而且地主及大資产階級中头脑比較清醒的一部分人，也感到了民族灭亡將給予他們的根本利益以威胁。在民族矛盾大过階級矛盾的条件下，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国民党又被迫开始向停止內战、联合共产党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这个方面轉化。所以，第二次国共合作，国民党从国共兩党敌我矛盾的“敌”之一方，轉化为中国人民抗日民族統一战綫与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之間敌我矛盾的“我”之一方，是由于它接受了中国人民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这个共同基础。尽管他們抗日是并不积极的，它們也并未实际上真正放弃反共、反人民的阴谋，但在抗日救亡高于一切这个共同基础上，它們反共、反人民的活動，不得不比較隱蔽和处于非法地位。所以，当时国民党同我們党所代表的中国人民之間的矛盾，仍然屬於抗日民族統一战綫內部的矛盾，不过这种矛盾却是經常处于对抗状态，这种矛盾的性質，主要是对抗的性質。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国民党同我們党所代表的中国人民之間，因民族危机而暫時建立起来的共同基础消失了，国民党中的当权派由其階級本性决定，又不願意接受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根本立場，而要坚持反共、反人民的

反动立場，于是，国民党便又彻底轉到与全国人民为敌的一方了。

由于敌我矛盾的基本特点是矛盾双方根本利益根本立場的不可調和，矛盾的轉化，不是我降于敌，便是敌降于我，否則便不可能有什么轉化，因此，站在“我”之立場而欲促成敌我矛盾的轉化，只有加强和“敌”之斗争，这斗争的胜利可能以三种形式表现出来：一是彻底、干淨、全部地消灭敌人；二是將敌人繳械、迫使敌人投降，从而使他們丧失作为敌人的身份与能力；三是爭取敌人中的某些部分的起义或因势利导促使敌人放弃作为敌人的身分和条件。前一种形式不存在矛盾的轉化問題，而是矛盾的消灭或解决；后两种形式都包含着矛盾的轉化，即由敌我矛盾轉化为人民内部矛盾。但是，第二种形式却由于敌人只是被迫地失去作为敌人的身份和能力，而不是敌人已經从根本上放弃他們的根本立場，因而从形式上來說，他們失去了作为敌人的身分轉到人民方面来了，但矛盾的性質还不能不是对抗的。只有当他們被迫繳械投降后，經過改造，真正放弃了敌对的根本立場，那才进一步由对抗性矛盾轉化为非对抗性矛盾。只有第三种形式不仅是已由敌我矛盾轉化为人民内部矛盾，而且也由对抗性矛盾轉化为非对抗性矛盾。

人民内部矛盾，一般說来，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人民最高利益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这个最高利益的一致，便是人民内部矛盾着的双方的共同基础。这个基础的破裂，便导致矛盾由内部轉化为外部。所以，由人民内部矛盾轉化为敌我之間的外部矛盾，便以矛盾双方的共同基础的丧失、破裂为标志。这可能有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原本互相敌对的阶级，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由于有着共同的敌人或者其他种种原因，在许多重要问题上利害一致，因而在那个时期他们曾经同属于人民内部，他们之间的矛盾曾经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但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双方共同的敌人已经被打倒或消灭，双方利害一致的共同基础已经消失，于是，双方固有的敌对性的矛盾便突出起来，那与历史前进方向相抵触的一方，如坚持其原阶级立场，坚决阻挠历史的前进，就由原来的人民内部的成员，转到人民敌人的位置，他们与人民之间的矛盾，就由人民内部的矛盾转化为敌我之间的对抗性矛盾了。资产阶级右派同人民之间的矛盾，就是这样转化的。

第二种情况是：在革命的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的内部，也会有一些不坚定的分子，他们经受不了阶级斗争的长期的历史考验，往往在与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时候，又同时接受了阶级敌人的思想观点以至生活作风的腐蚀。这些不坚定的分子，如果不提高警惕，不及时改正自己的错误，当革命形势日益深化的时候，便可能从革命的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的内部分化出去，转到反革命的方面。同样的道理，人民内部自然也会有某些不坚定的分子、阶层或社会集团，因而在革命形势进一步深化的时候，便免不了会引起人民内部的那些不坚定的部分的分化，大部分由不坚定转向坚定，也会有一小部分转到人民敌人的方面，从而他们与人民之间的矛盾，也便转化为敌我之间的对抗性矛盾了。这种情况，在目前暴露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中，特别是在党内右派分子中，是不乏例证的。

第三种情况是：由于对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当，在一定的

外力影响下，也有促使人民内部的非对抗性矛盾转化为敌我之间的对抗性矛盾的可能性。

前面说过，一定历史条件下人民最高利益的一致，是人民内部矛盾着的双方的共同基础。所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不能不顾到一个大前提，亦即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维护和发展人民的最高利益。“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就是在这个前提下制定出来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原则。

人民内部矛盾着的双方不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不是为了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双方分歧越来越大，对立性越来越加深，便产生了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就是：先由矛盾的非对抗性转化为对抗性，再进而导致内部矛盾转化为外部矛盾。这种由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为敌我矛盾的转化过程，大致是：由矛盾的非对抗性经过逐渐激化而发展到对抗性，再进一步由于对抗性的加深，以致导致共同基础的破裂，于是乃由内部矛盾转化为外部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亦即敌我矛盾）。

人民内部这部分人民同那部分人民之间产生矛盾，一定存在着一个是非问题。这个是非问题不辨明，矛盾便存在，矛盾着的双方的隔阂便存在。是非不会停留在原地，矛盾不会不发展，隔阂也不会不加深，一旦遇到外力的挑动（阶级敌人的煽动、勾引、挑拨等等），最后也有导致共同基础的破裂，由内部矛盾转化为外部矛盾的可能。只是这种转化过程是：由无原则的貌合神离的团结，经过矛盾的潜在加深，逐步到达矛盾的潜在激化，通过外力的作用，终于发生突变而由内部矛盾转化为外部矛盾。

所以，没有团结的愿望，便谈不到进行善意的批评；不开

展实事求是的善意的批評，不辨明是非，便不能巩固團結，更談不上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團結。

从人民內部矛盾轉化为敌我矛盾，可能还有其他情况，但大致上就是这三种。

*

*

*

正确地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先决条件，就是要善于識別矛盾，分析矛盾。具体問題必須作具体分析，切不可抓住一个公式就硬搬硬套。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演，对我们处理人民內部矛盾，指出了基本原則，也指出了方向和途徑，但它毕竟不能代替我們去具体識別矛盾、处理矛盾。人类社会間的矛盾，真是千差万別、錯綜复杂得很的，要能具体地識別矛盾，从而能正确地处理矛盾，就还得深入到实际生活、实际斗争中去，認真地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对矛盾进行具体的分析。这次全国范圍内开展的反右派斗争和党的整风运动，正是給我們具体識別矛盾，从而学会正确处理矛盾的一次深刻的鍛煉。

人民内部矛盾在我国当前上升 为主要矛盾的根本原因

凌 雨 軒

事物就是矛盾，生活就是矛盾，不論自然界或社会生活中到处都充滿着矛盾。人与人之间由于地位的差别，生活的各异，要求的不同，也就在各方面产生了矛盾。这种情况最显著、最突出地表现在敌对阶级之間，由于他們之間根本利益的敌对，他們之間的矛盾就具有不可調和的对抗性質。但这种情况在根本利益一致的人民内部，也有所表现。例如，革命事业的領導者和人民群众之間就有矛盾，这是由于他們在国家生活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决定的。領導者，直接行使着管理权力，不可避免地使他与直接的生产和群众的实际生活有一定的距离，他的地位使他站得高一些，因而比較能够看到長远的要求和整体的利益，但也比較容易疏忽人民群众的具体要求和实际利益。人民群众，直接参加生产劳动，主要是体力劳动，他們比較难于了解全部复杂的情况和各方面的問題和困难，他們提出的要求和問題总是很实际很具体的，但也比較容易重視局部的困难和眼前的利益。这种由于地位不同而产生的差异，本身就是一种矛盾。毛主席在“矛盾論”中論述矛盾的普遍性絕對性原理时即明确地指出，相互联系中事物之間的差异就已經包含着矛盾，差异就是矛盾。如象工农之間，

使在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也有差异，他們的差异就是矛盾。不过这种矛盾不是阶级的对立，不会激化成为对抗。尽管矛盾的性质和采取的形态不同，但每一差异中就包含着矛盾，这却是普遍的、绝对的。^①因此，工人和农民之间、领导者和人民群众之间等等人民内部的矛盾，就不是我国当前一时的现象，而是过去就存在过，将来还会存在的长期的现象。事实上，我们党长期以来强调在领导工作中贯彻群众路线，就是为了避免领导者的片面性，为了尽量缩小和消除领导者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十分重视加强工农联盟的问题，把它提高到党的战略方针的高度来处理，这是因为工农之间的团结一致是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工农之间根本利益的完全一致，使他們有可能建立巩固的联盟，完成革命大业。但是他們之间对革命的具体要求以及若干实际利益又并不完全一致，是存在着现实的矛盾的。党如果不经常通过加强工农联盟来调整 and 解决这一矛盾，那就会给革命事业带来重大的危害。至于今后，只要城乡之间的界限尚未消除，工农业生产之间的差别仍然存在，那么工农之间的矛盾也就会继续存在。领导者与群众之间的矛盾可能会存在得更长久些。可见，人民内部的矛盾是一个长期的、普遍的现象。

那么，为什么人民内部的矛盾在我国当前条件下，会上升到显著地位而成为主要矛盾呢？造成这种转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有人说，这是因为近几年来党的方针、政策发生了严重的

^① 見“毛澤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295頁。

偏差和錯誤的結果。這是根本不正確的。我們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全面地總結了黨領導兩次革命取得勝利和建設社會主義的經驗。黨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中指出，黨從“七大”到“八大”以來的路線、方針是完全正確的。絕大多數具體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也都是正確的。其中主要的如黨領導全國人民爭取人民民主革命勝利的正確方針；黨所提出的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總路線、總政策；黨所制定和實施的對資本主義和平改造和農業、手工業合作化的政策；以及加強人民民主專政、促進經濟和文化發展繁榮的若干重大政策和措施。報告中極有說服力地論證了黨的這些路線、方針和政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實際情況相結合的結晶，是經過實踐的檢驗被證明符合廣大人民的要求和行之有效的。正是黨的正確的路線和方針，動員人民進行鬥爭，並指導着人民的行動，因而才推進了我國社會的迅速發展，引起了我國社會生活各方面的根本變化和巨大的進步。這些事實是每一個面對現實的人所不能不承認的。報告中也批判了黨的工作中的若干缺點和錯誤。在這些缺點和錯誤中，有一些是由於缺乏經驗因而使得某些政策的制定和措施並不是始終都很準確、穩當，特別是在大規模經濟建設中，有些方面不得不經過一些彎路而摸索前進；也有一些是因客觀情況發生了新的變化，原來是正確的政策未能即時隨之改變，因而造成了錯誤；但更多的是一部分黨員、幹部由於思想作風上存在着缺點和錯誤，而在執行黨的正確的方針、政策中所發生的偏差和錯誤。

某些黨員、幹部思想作風上的錯誤和執行政策中的偏差，會引起局部地區或在局部問題上的人民內部矛盾的加深和擴

大。但这毕竟是局部的现象，不能用它来解释在全国范围内为什么人民内部矛盾会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根源。同时，也决不能因为局部的缺点和错误，而抹煞我们整个国家的伟大进步和各方面工作的重大成就；决不能根据社会改革运动中的某些偏差，而否认整个运动对推动社会进步的伟大作用；决不能把局部的错误夸大成整个党的路线、方针的偏差和错误。因此要从党的路线、方针的偏差和错误中找寻人民内部矛盾其所以在当前突出暴露的根本原因，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有人認為，人民内部的矛盾其所以会成为我国当前主要的矛盾，是由于人们的无止尽的欲望，人民的过高要求和一部分人民群众的落后所引起的。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議論。如果說，人们的欲望是指的人们的需要，即生活消费的要求，那么满足这些要求正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它和生产经常起着相互推动的作用，成为刺激生产发展的一种力量。随着生产的发展，人民的需要不断提高，这正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也是社会发展的正常现象。誠然，在我国目前生产和需要之間是存在着矛盾的，但这种矛盾是經常的现象，不仅現在存在，过去也存在过，將來还会長期存在。問題是为什么恰恰在目前这一矛盾突出地显露出来呢？用人们的欲望来解释，是不能回答这个问题的。

至于說人民群众中有人对生活問題提出过高的要求和部分群众有落后的表现，这是事实。但群众的某些过高要求，多半是由于他們不了解整个国家的情况和困难，加以领导者又缺乏經常的思想政治工作所造成的，不能不加分析地归之于落后的个人主义意識。即使有人因为本身落后而要求过高，

产生抱怨,这毕竟是少数。而且人民群众中有落后的部分,这是一种经常的现象,并不是目前才发生的。因此,它不能解释目前我国国内生活中的人民内部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的根本原因。同时,如果把一切责任归之于群众的要求过高和落后,这就会使我们在认识和处理当前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犯错误,因为这样就会过分地责怪群众,苛求群众,忽视党和政府工作中的缺点,因而不能揭露矛盾的真实情况并切实地解决矛盾。

又有人说,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对我国人民内部矛盾有没有影响呢?影响当然是有的。这种影响主要是:人民群众通过波、匈事件受到了教育;波、匈事件也影响了少数人,主要是一部分知识分子,增长了对民主的极端理解和无原则的滥用,对抽象的民主的赞扬和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向往,逐渐有些抬头;也促使了党能够从现实的事件中吸取经验教训,通过事件教育党和人民,并可能使得对人民内部问题的处理更加稳妥、更加正确。这些影响都不能解释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源和它在当前特别显露的根本原因。同时,波匈事件对我国内部发展的影响毕竟是一种暂时的、偶然的因素,而我国当前矛盾形势的转化,敌对阶级的矛盾降到次要的地位,人民内部矛盾上升到主要的突出的地位,是社会生活中带有根本性质的转变和普遍的现象,偶然的因素决不能构成某种根本转变的决定原因。

那么,究竟什么是我国当前人民内部矛盾上升到显著地位而成为主要矛盾的根本的、决定的原因呢?

这要从我国社会发展的目前的根本特点,从我国目前所处的社会大变动中,去寻找答案。

随着革命的进展和革命形势的根本变化，我国社会很久以来即处于大变动之中。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一次大变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一次更大的变动。目前我国社会的发展处于另一次更为深刻、更为复杂的大变动之中，这是几万万人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偉大运动，是一场偉大的，用和平方法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的斗争。经过人民自己的斗争，埋葬了罪恶的剥削制度，我国几千年来的私有制已经走完了它的历史途程，阶级对立的社会制度基本上被消灭了，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基本上建立起来了。这样就使得生产力的发展与旧生产关系之间的冲突已经获得基本的解决，并促成了生产力的强大迅速的发展；也保证了我国人民内部，工人与农民之间，各民族之间，以及党、政府和人民群众之间，在新的基础上形成了空前未有的偉大的团结。这正是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特征。但同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也出现了新的矛盾。而这种矛盾在国内敌对阶级之间的斗争已经基本结束的条件下，必然地会以人民内部的矛盾表现出来。因而，随着大规模阶级斗争的结束，随着已往的主要矛盾——敌对阶级之间的矛盾的逐一消失或是基本解决，旧的剥削阶级的基本势力已经被打倒，剩下的是有待继续肃清的残余力量，敌对阶级之间的矛盾再不是国内经济、政治生活的基本的大量的现象，这样，人民内部矛盾必然会在历史舞台上上升到突出的显著的地位，而成为主要的矛盾。

当国内敌对阶级存在的时候，大敌当前，打倒当前的敌人，铲除产生现实生活中不合理现象和许多罪恶现象的根源，

自然地会成为人民群众奋勇斗争、全力以赴的主要目标，人們也往往把一切希望寄托于对敌斗争的胜利。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群众自己的若干要求和人民内部的許多問題就不得不处于次要的、服从的地位，人民也暂时可以容忍、可以原谅。但是当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当前的敌人被打倒了，新的社会制度建立起来了，人們迫切地要求充分无遺地发挥新制度的优越性，要求各种具体制度和政策更能有效地促进生产的发展，要求生活得到更好的改善，对于因为經濟和政治制度某些具体环节上的缺陷而妨碍着生产的发展和生活的提高，常常表現不能容忍，急于要求纠正，对于党和国家的领导机关以及各級领导者，也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这些都是由于社会大变动中的新形势促使人民内部矛盾显著突出的若干新因素。这是新形势带来新情况的一方面。

情况的另一方面是我国社会发展中所经历的深刻而复杂的大变动，必然地会在全国人民的思想有所反映，各阶层人民（包括我們党的广大党员）一下子很难适应新的形势。正如“人民日报”在“全党必須認真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社論中指出的：“在这样巨大的复杂的变化中，人們一方面兴奋地看到了新时代的光明的前景，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会感到这样那样的不习惯，不协调，生疏，不摸底，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特别是目前我們的新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未完全巩固，許多方面的变动还在繼續，这就不能不反映在人們的心理上和看法上的动荡和經常的变化。这就是人們常常說的：認識（或思想）赶不上形势，或是用老眼光对待新問題。资产階級分子由剝削者逐漸地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要他們放

弃剝削，放弄奢侈的寄生生活和资产阶级的思想行为，这确是“脱胎换骨”的改造过程。他们之中事实上有些人经过党的工作和教育，自觉地起来掌握自己的命运，比较积极主动地改造自己，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其中也有些人并不是这样。他们口头上接受社会主义，而实际上是希望回到资本主义。他们留恋资本主义，夸大资产阶级的积极的一面，主张资产阶级不必继续进行改造，并在实际上拒绝工人阶级的领导。现在不是已经出现了什么“资产阶级已不存在两面性”、“要求延长‘定息’到20年”、“从公私合营企业中撤出公方代表”等等喊声了吗？这正说明了要使得这些人的思想适应于我国社会发展的新时代，还须要进行长期的改造、教育和必要的斗争。原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现在已经丧失了原有的阶级基础，正在转变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要他们直接和为他们一向所轻视的工人、农民生活在一起，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直接用他们的知识为工人农民服务。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又不得不碰到一些原来所不熟悉、不习惯的新的人和事，新的制度和方法。这一切正使得他们原有的阶级意识、思想情感以至生活习惯一时就很难适应。他们之中的一小部分人由于坚持资产阶级立场，就可能走上背离社会主义和与人民为敌的危险道路；其他大多数能够接受党、工人阶级的领导和教育，经过长期的自我改造，对新制度和新生活就可能从不顺眼到顺眼，从不适应到适应。广大的农民从个体生产走上集体生产，这是一个根本的转变，这不仅使他们离开了私有制度，离开了小块的私有土地和其它的生产资料，而且也使他们离开了与分散的个体经营相联系的若干传统习惯，这自然会带

来生疏、不摸底和不能适应。工人阶级本身也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动，也同样存在着许多不能适应新形势的情况。近几年来，工人阶级的队伍扩大了，许多农民、青年学生及其它阶层的成员成为工人阶级的新的组成部分。这就发生了在这种新情况下工人阶级队伍的巩固和团结的问题，发生了新的成员一时不能习惯于新的生活的问题。

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和国家政权实行了对全国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的领导，但是我们缺乏进行大规模建设的经验，特别是由于我国是一个6亿多人口的大国，过去的经济非常落后，这就不能不在建设中遇到更复杂的问题和更多的困难。我们对在国内敌我矛盾已经基本解决的情况下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也缺乏经验。在党和政府的许多领导者和干部面前，产生了不熟悉的人民内部矛盾显露的新情况，而他们没有处理这种情况的现成的经验和方法。这同样也表现了对新的形势的生疏和不能适应。

人民日报在“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中，曾扼要地指出这种情况：“在一方面，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同它们的知识界，在目前整个社会生活的大改组中间，还不能适应或者还不能完全适应新的环境，还需要一段很长的继续自我改造的时间。在另一方面，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和以共产党为核心的人民政府，在领导社会主义的建设方面还缺乏经验，还免不了要犯这样那样的错误。”这一切都说明了由于社会大变动的新形势，很自然地会带来一系列的现实问题和新的矛盾。

从各阶层人民所处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不同，以及在社会生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从社会发展的时代特点，即从目

前社会的大变动中，来说明人民内部的矛盾以及它所以在目前上升到显著地位而成为主要矛盾的根本原因，这是完全符合于历史的现实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的。同时，也只有从这里来寻找根源，才能说明这些现象是社会发展的深刻的内部过程的反映，是历史进程中的一种客观的、必然的现象。但是，这只是针对着人民内部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总的趋势来说的。至于说到某些具体的人民内部矛盾为什么会产生，有些矛盾为什么在一定的时间和地点会尖锐化和扩大化，这需要作具体分析，需要考虑多方面有关的因素和条件，找出主要的原因。但在这里，党和国家某些领导机关和领导者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在若干具体政策和措施中的偏差和错误，常常起着重要的作用。

前面已经说过，我们党在过去几年中总的路线、方针是完全正确的，絕大多数的具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也都是正确的。但是，这不是说实际工作中就没有缺点和错误。事实上特别是在各级领导机关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中，曾经发生过若干的缺点和错误。当然其中有些是由于经验不足所造成的，但更重要的则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思想作风的危害。应该承认，在新的形势下，党和政府的一部分干部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滋长了骄傲自满的情绪，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有了一定程度的增长。例如，不去仔细地研究党的政策、指示的精神和工作的实际情况，而是主观地、生硬地决定工作计划和采取措施；在工作中不了解下情，不了解群众的思想动态，不倾听群众的呼声和意见；漠视群众的要求，工作中的许多问题能够解决的不去解决，应该

办的不积极去办；甚至粗暴地压制群众的意見和要求，損害群众的权利和利益等等。这些情况在最近人民群众的許多正确的批評和意見中均有所反映，并証明这些缺点和錯誤还是相当普遍的。这样就会損害某一部分群众的积极性，造成群众的不滿，并在事实上会因此而人为地造成若干矛盾，或是使客观上已有的某些矛盾加剧和扩大，促使某些人民内部关系的尖銳和緊張，而鬧事事件的发生，也多是在这里播下种子的。

当然問題还有另外一方面。一部分群众对个人和集体、个人和国家、局部和整体、暂时和長远的关系，未能树立正确的看法和进行恰当的处理，这也会反映在人民内部矛盾中，促使某些矛盾复杂化和尖銳化。但即使在这一方面，领导机关和领导者也并不是沒有責任的。因为领导者放松对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缺乏从群众的亲身体会和迫切要求进行說服教育，常常成为造成群众无法了解全面情况，发生認識上的偏差，以致某些錯誤思想不能即时得到糾正的重要原因。

因此，人民内部矛盾的緩和和解决，要依靠人民相互之間的諒解和合作，要通过全体人民能从团結的願望出发，經過批評和自我批評，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結。但是，领导机关和领导者負有重大的責任和特殊的任务。正是着眼于这一点，党的整风运动要求首先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着手来解决問題。

談人民內部矛盾的長期性和今天強調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重要性

雪 之

什么是人民內部的矛盾，人民內部矛盾表現在哪些方面，這些問題已經有不少人談過了。現在我要談的是：人民內部矛盾的長期性和今天強調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重要性。

從現實生活中體會人民內部矛盾的長期性

人民內部的矛盾過去有，今後還會長期存在，這是一個客觀實際。研究人民內部矛盾的長期性，可以從我國現實的經濟情況談起。我國本來是個落後的農業國，全國解放的時候，即1949年，現代工業占工農業總產值的比例只有17%。解放幾年來，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領導全國人民克服了各種困難，恢復了被蔣介石集團搞得趨於絕境的國民經濟，並順利地實現着第一個五年計劃。工業建設的發展，速度很快，鋼的產量在1949年只有15.8萬噸，1956年底已提高到446.5萬噸，並且開始有了自己的各種大型工業，如汽車製造廠、飛機製造廠和重型機器製造廠等。1956年現代工業的產值已占工農業總產值的39.1%。以上海來說，1952年上海還只能煉6萬多噸鋼，現在已能煉50多萬噸鋼，過去只會修理船隻，現在已能自造新型大船，過去不能製造的工作母機，現在也能製造了。總

之,解放以后 8 年的成就,超过历史上 100 年的成就。这说明了我国是在向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光辉前途迈进着。

但是,我国是个大国,原来又很穷,现有的进步,还不能使我们摆脱落后的农业国的状况。我国的工业生产水平,还远远落后于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如苏联和捷克。和英、美这些资本主义国家来比,我国的工业也还赶不上他们。要使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一个先进的头等的工业强国,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并且集中力量,化上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进行各项工业建设和现代化农业的建设。在这一个建设的过程中,不可能满足人民各个方面的需要。所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指出,我国国内目前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个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在今天必然会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而且这个矛盾在客观上将是长期存在的。在社会意识方面,社会主义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集体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也会在各方面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这种矛盾,也将是长期存在的。所以我们说,人民内部的矛盾是长期存在的。

就举上海的住房问题为例吧。上海抗战前只有 300 多万人口,解放前已增加到 500 多万,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十余年中没有造什么房子,也根本不会想到解决职工和市民的住房困难,因此人民尤其是劳动人民的居住条件一直十分恶劣,住房严重不足。解放几年来,人民政府已经在上海修建了

330 多万平方公尺的职工宿舍，解决了 60 多万人的居住问题。但是，还有很多职工和市民的居住条件一时难以改善，房屋问题仍是一个大问题。这是因为：第一，原来的房屋严重不足，新建的一些还不能满足需要；第二，历年来人口不断增加，原来没有困难的也产生了困难；第三，由于人民生活的改善，有些人对居住条件的要求也提高了。有人问：是不是可以多用些钱来造住房呢？国家需要集中力量搞工业化，用于造住房的钱是有限度的，如果不搞工业建设，不要五年计划，当然可以有更多的钱来造住房，但那又违反了人民对建立先进工业国的要求，是违背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人民是不会同意的。而且，即使可以挤出更多的钱来造住房，也还受着现实各种条件的限制，不是主观上想一想就能办到的事。如钢筋、水泥、砖、瓦、木料等建筑材料供应不上，或者是从外地运材料来上海的运输工具不够，那么，有钱还是造不成房子。1956 年上海市人民政府拨了 1500 万元造住房，结果就是因为建筑材料供应不上和运输工具有困难而没有能够完成计划。那么，什么时候我国的钢筋、水泥等建筑材料和运输工具才能全部满足各方面的需要呢？那是在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高度发展的时候。这当然就不是短时期的事。再说，即使按照今天的住房标准，有一天可以满足需要了，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呢？不是的。随着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人民的需要也会不断增加和提高，老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产生。今天是没有房子的人要求有房子的问题，将来会是有了房子的人要求住得宽敞一些，或者要求住得好一些的问题。那时，新的矛盾还须我们在新的基础上来加以解决。这个事例使我们懂得：对于人民内部的

矛盾，要作具体分析，要研究其历史原因，要从事物的内在联系看问题，不能孤立地看问题。也使我们懂得：在不同的条件下，会有不同的矛盾出现。所以，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也是复杂的长期的工作。不只是住房问题如此，其他人民内部存在着的矛盾，如青年不能全部进中学和升大学的问题，人民生活改善的速度问题等等，都应该这样看。

我们还可以从领导和群众之间矛盾产生的原因和解决的方法来看人民内部矛盾的长期性。

有些部门由于有些领导人员存在着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工作作风，既不深入了解下情，又不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甚至有压制群众的意见和要求的现象，对该办的事和可以解决的问题，不积极认真地去解决，因而引起群众的不满，产生了领导和群众之间的矛盾。所以整风要从领导人员整起，改善领导和群众的关系也要领导人员多负些责任。但是，领导人员工作作风比较好的地方，领导人员主观上没有犯什么错误的地方，领导和群众之间，同样也会有矛盾出现，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领导人员和人民群众处在两个不同的地位。领导人员处在直接行使管理权力的地位，他们比较能够考虑到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但往往容易疏忽人民群众的具体情况和切身利益。人民群众处在直接参加劳动生产的地位，他们不大容易了解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部情况和困难，因而比较容易重视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对生活的改善有时会提出过高的要求。领导人员和人民群众所处的这两个不同地位，客观上决定他们难以避免产生矛盾。所以人民群众和领导之间的矛盾，并不仅仅是领导作风好坏的问题，也并不都是因为

領導人員主觀上有缺點造成的。如住房問題不能解決，就出現了群眾和房屋管理部門的矛盾；兒童上學有問題，群眾就對教育部門的領導人員有意見；副食品供應不足，群眾就對商業部門不滿意。象這一類客觀上存在、一時不能解決的矛盾，也是通過人民群眾和領導之間的矛盾而表現出來的。不過，領導人員如果有官僚主義、主觀主義的作風，就會增加矛盾的產生，或者是加深矛盾的程度。

產生人民群眾和領導之間矛盾的主要原因既然是所處地位不同的關係，那麼，解決這個矛盾的前提就是要消滅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之間的重大差別，這是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做到的。將來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之間的重大差別消滅後，領導人員（管理人員）和一般被領導人員之間會不會還有矛盾呢？一般說，到那時不會再存在現在這樣形式的矛盾，但矛盾還是會有的。至於具體的形式怎樣，因為是很久以後的事，現在去研究它，沒有現實意義，所以暫且不去談它。就當前來說，要解決領導和群眾之間的矛盾，首先要求領導人員克服官僚主義、主觀主義的工作作風，加強和人民群眾的聯繫，多多听取來自人民群眾的意見，關心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及時幫助人民群眾解決可以解決的問題，以減少矛盾的產生或減輕矛盾的程度。同時，要加強對人民群眾的思想教育，幫助群眾提高認識，使他們能逐步地正確地認識個人利益和整體利益、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之間的關係而自覺地和領導合作。

克服官僚主義和主觀主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官僚主義是舊社會的產物，是封建意識和資本主義思想在人們思想意識中所起的影響，要鏟除這種影響，是需要作長期鬥爭的，何

况資本主义还在世界上存在,它还时时刻刻地散布着毒素,要清除这种毒素,就要从根本上消灭資本主义制度,这当然是比較長期的艰苦的斗争。而要克服领导人員的主观主义作风,培养主客观一致的实事求是的作风,要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文化水平,也都需要一个長期的过程。同时,客观形势在不断地发展,社会主义建設在不断地前进,而人們的思想認識往往跟不上客观形势的发展。领导人員的某些主观主义克服了,在新的情况下往往又会产生新的主观主义,人民群众的認識水平提高了,在新的形势下又会产生新的問題。所以,克服领导人員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水平,都是長期的反复的努力过程。因此,人民群众和领导之間矛盾的解决,也是長期的反复的过程。

旧的矛盾克服了,新的矛盾又会不断出現,这是事物发展的規律。因而也可以設想,即使社会主义建設成功,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后,在新的基础上又会产生新的矛盾,不过,那时矛盾表現的形式不同罢了。

为什么今天要強調解决人民內部矛盾

人民內部的矛盾既然是一个長期現象,为什么今天又要特別強調提出解决人民內部的矛盾呢?

这是因为:第一,目前社会主义革命已經基本上取得了胜利,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經基本上結束(不是完全結束),敌我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上解决(不是完全解决),因而人民內部的矛盾就显得突出而需要強調加以处理了。但我們許多同志,对这一变化还缺少敏感,不正視客观存在着的人民

內部矛盾，甚至有人認為社會主義社會沒有矛盾，同時也還不善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因此，注意當前國內生活中這一新的重大的現象，學會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在今天就更有必要特別加以強調。第二，我國目前的社會主義革命已經基本取得勝利，但這主要是指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改變而言的。在政治上、思想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還沒有解決。這裡有愛護社會主義的人民和少數破壞社會主義、企圖使資本主義復辟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之間的矛盾，這是敵我矛盾。我們和右派分子的鬥爭，必須要進行到底。除了和右派的矛盾以外，社會主義思想和資本主義思想之間的矛盾，也是人民內部矛盾的一個重要方面，這個矛盾如果不解決，社會主義思想如果不能徹底打垮資本主義思想，那麼社會主義建設也還是不可能順利地進行，但不少同志對上述形勢，也還沒有正確的深刻的認識。所以，今天強調解決人民內部的矛盾，進一步從思想上來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是完全必要的。第三，當前人民內部矛盾中，有很多具體矛盾是可以很快得到解決的，過去由於主客觀各方面的原因，人們沒有注意及時予以解決。假使讓能夠解決的矛盾發展而不加解決，那就會或多或少地影響社會主義的建設。今天強調提出解決人民內部矛盾，提醒人們把那些可以解決和應該解決的矛盾立即妥善加以解決，是很必要的。

以農民問題為例，來說明這一個問題。解放前，我國農民深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重重壓榨，生活困苦不堪，當時農民的主要問題是在共產黨領導下，和階級敵人作鬥爭，爭取早日搬掉壓在他們身上的三座大山。今天革命

胜利了,农民和阶级敌人的矛盾解决了,并且已经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合作化道路,现在农民们的努力目标是巩固合作化的成果,提高生产,支援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逐步改善自己的生活。那么,当前农村中存在着哪些人民内部的矛盾呢?首先是农民内部社会主义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及其他落后思想意识之间的矛盾。其次,有些农业合作社因为经营管理上经验不够而存在着缺点,或者因为有些社的干部执行政策中有偏差,因而产生了社员和某些社领导之间的矛盾。再次,政府有关部门在农产品和农副产品的收购,农具、肥料、日用品等的供应,对农业生产的领导,对自然灾害的预防和克服等许多工作中,都有很大的成绩,但也有缺点,这些缺点也造成了农民与政府某些部门或某些工作人员之间的矛盾。上述矛盾虽然都是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但是,如果不强调加以解决,同样会影响人民内部的团结,影响农民生产积极性的进一步提高。

从农民问题看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如此,其他如城市中工人阶级内部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都已经和革命胜利前不同了。这些矛盾,虽然一般都是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但是不容忽视,必须强调解决它,才有利于人民内部的团结,使社会主义建设更顺利、更迅速地进行。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講演中說:“許多人不敢公开承認我国人民内部还存在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許多人不承認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使得他們在社会矛盾面前縮手縮脚,处

于被动地位；不懂得在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統一和团结日益巩固。这样，就有必要在我国人民中，首先是在干部中，进行解释，引导人們認識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并且懂得采取正确的方法处理这种矛盾。”这段話不但把今天为什么要強調提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因說得很清楚，而且也教导我們應該正確地去認識不断出現的人民内部矛盾，并积极地、正確地处理它們。

分析当前我們所碰到的具体矛盾，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条件已經具备了，馬上可以解决的；一类是目前还不能解决，須要等待时机或者創造条件才能解决的；一类是属于更長期的，不是短时期内能解决的。对于那些可以立即解决的矛盾，固然應該积极加以正確地处理，即使那些暂时不能解决的矛盾，也应该尽一切努力去減輕或者緩和它。

上海有一些單位，原来領導和被領導之間存在一些矛盾，在这一次整风中，由于发揚了民主，把許多問題攤开来研究，領導主动地檢討，認真地研究，積極地处理，結果，不但把許多积压的老問題、旧糾紛都解决了，而且也改善了領導和被領導之間的关系。

又如上海的住房問題緊張，这是一个長期的矛盾，但是經過主观努力也可以緩和。前一个时期，市、区各領導机关帶头緊縮办公用屋，結果騰出了10万平方公尺以上的房屋，作为办学校、做宿舍和其他急需的用处。不但制止了有些机关、团体浪費用屋的情况，推动了節約風气，同时因为解决了急需用房者的需要，也就多少緩和了房屋緊張的矛盾。象这样的事例还很多。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說：人民內部的矛盾，一方面是客觀長期存在的，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也是長期的任務，任何企圖在幾天內就解決所有矛盾的主觀急躁情緒，是違反事物發展規律的，應該反對。但另一方面，當前又必須強調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重要性，要把許多經過主觀努力可以求得解決的矛盾加以解決，把那些雖不能立即解決但可以設法緩和或減少的矛盾，盡量求得緩和或減少，所以又必須反對借口強調矛盾的長期性，而對應該解決和可以解決的問題，採取聽之任之，不積極處理的態度。

強調解決人民內部矛盾不要忘了階級鬥爭

強調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目，是為了進一步加強人民內部的團結，更好地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這是全國人民的看法和做法。但是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不願意我國走社會主義道路，他們借口解決人民內部矛盾而向共產黨、向社會主義進行攻擊。所以在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過程中，還有激烈的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階級鬥爭。

我們知道，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是舊社會的產物，在社會主義制度內，是不容許它們存在的，所以共產黨要領導大家來反對這三個主義，也只有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在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里，才會提出反對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但是右派分子卻說“社會主義制度是產生三個主義的根源”，意思也就是說要反對三個主義首先就要反對社會主義制度。這種顛倒是非的說法的目，是想煽動人民跟他們一起反對人民民主專政制度，反對社會主義制度。

右派分子借口黨員和群眾之間有矛盾，而要“共產黨退出學校”，要“公方代表退出合營廠”，說“黨的領導可以削弱一點”，甚至要共產黨“下轎”“下台”，由“各民主黨派輪流執政”。他們的意思是很清楚的，就是：不要共產黨領導。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右派分子“不要共產黨領導”的叫囂，其目的是想推翻共產黨，讓資本主義制度復辟。

右派分子還借口關心人民生活，散布農民苦的空气，製造農民和工人之間的矛盾；誣蔑基層幹部違法亂紀，挑撥群眾和共產黨、人民政府之間的矛盾。他們口稱“代表人民”，實際上是代表一小撮反共反人民的反動分子的利益。

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各种破壞活動，在最近几个月來已暴露了大量的事實，教育了我們每一個人，使我們認識到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階級鬥爭還是不能放鬆的。因此，當我們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加強人民內部團結的時候，要隨時警惕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借口解決人民內部矛盾而破壞人民內部團結的陰謀。

在我們人民內部，還隱藏着極少數的反革命分子，他們還不時地要進行破壞活動，散布反動謠言，製造恐怖事件。當我們努力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時候，在北京，有反革命分子用炸彈行刺曲正同志的事件。在山東，有反革命分子殺死共產黨員鄉長一家七口的事件。在廣東，有反革命囚犯殺死國家機關幹部和家屬、居民七人並進行搶劫的事件。這充分說明，必須提高警惕，堅決執行“有反必肅”的方針，以保衛人民民主生活的正常秩序。

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也好，反革命分子也好，他們的破壞活

动都是对帝国主义有利的。帝国主义不但是反革命分子的后台老板，也直接間接地影响着右派分子。我們和帝国主义的斗争是長期的、复杂的，在国内对于右派分子的斗争，对于資本主义思想的斗争，也必然是長期的、复杂的。任何忽视对右派分子的斗争，或者認為經過这次斗争，右派分子就“再也沒有了”的想法，都是不对的。

(1957年8月4日)

正視和揭露人民內部矛盾的積極意義

馬 俊 芝

為什麼要承認矛盾？理由很簡單，因為矛盾是客觀存在的，不容你不承認、不正視。

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世界觀看來，矛盾不是一種消極的因素，而是一切事物發展的動力；事物的发展过程，就是矛盾不斷解決和不斷產生的過程。舊矛盾中包含着新的矛盾的胚胎，這個矛盾解決了，又產生了新的矛盾，又開始了新的矛盾運動，又有待於我們去解決。所以，矛盾是永遠解決不完的。每一矛盾的解決，事物的发展就前進了一步，這是事物發展的普遍規律。因此，如果說事物內部沒有矛盾，倒是天大的奇談怪論，如果是這樣，那就沒有事物的发展，活生生的世界就變為一具僵屍了。

過去不少人誣蔑共產黨人就是喜歡矛盾、喜歡鬥爭，沒有矛盾、沒有鬥爭也要去“製造”矛盾，“製造”鬥爭；這完全是胡說八道。共產黨人才不喜歡矛盾、不喜歡鬥爭哩！為什麼？武裝鬥爭要流血，思想鬥爭也要費口舌，總不如躺在床上舒服些。可是，不喜歡又有什麼辦法呢？我們喜歡美帝國主義者馬上滾出台灣去，不喜歡和它有矛盾，但它偏偏賴在我們國土上不走；我們也不喜歡和蔣介石集團之間有矛盾，希望他們回到祖國的懷抱里來，但他們至今還是執迷不悟，繼續和人民為

敌；共产党主动提出要和各民主党派長期共存，右派分子却偏偏要共产党“下台”、“下轎”，共产党人要他这个朋友，他却不要共产党人这个朋友……，如此等等。这叫什么？叫“矛盾”。有矛盾，就要斗争，想掩盖、想逃避也是办不到的。我們和右派分子之間的这场战斗，难道是共产党人挑起的嗎？恰恰相反，共产党倒是被迫应战。由此可見，在这里根本不是喜欢不喜欢矛盾的問題，而是矛盾客观存在着。

我們国家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敌对阶级之間的矛盾基本上解决了，在生产資料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基础之上，形成了全国人民空前未有的大团结，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这并不是說在人民内部就沒有矛盾了。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有矛盾，并且同样是在矛盾中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間、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間基本上相适应的情况下，某些个别环节上发生暂时不調和的現象，也就是說，发生局部的、暂时的矛盾，也是存在的。这就是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社会基础。当然，这种矛盾，和敌对阶级之間的矛盾是根本不同的，一般說来它不是建立在經濟上的剝削被剝削、政治上的統治被統治的基础之上的对抗性的矛盾，而只是正确意見和錯誤意見的矛盾，或是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暂时利益和長远利益的矛盾，但矛盾仍然是存在的。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内部也不是有无矛盾的問題，而只是矛盾的性質不同、解决矛盾的方式不同罢了。

既然人民内部存在着矛盾，那么正視它并且及时地把它揭露出来好呢，还是掩盖好呢？在我們看来，矛盾的存在既然是事实，就不如老老实实在地承認它、揭露它，以便找出适当的

方法去解决它。不揭露，早晚也要爆发的，紙是包不住火的；同时，对于馬克思主义者說来，根本沒有掩盖矛盾的必要。反动統治階級之所以不敢承認矛盾、揭露矛盾，是因为他們和劳动人民之間，是处在对立的地位，如果这种矛盾一揭露，就会象火山爆发一样將他們毀灭；而劳动人民則正需要揭露这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来解放自己。在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內部既然不存在什么根本利益的冲突，没有什么对抗性的矛盾，那么有什么可怕的呢？我們党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在政治上提出了扩大民主生活，提出了“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在科学艺术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就是为了及时地揭露和解决人民內部矛盾。

那末，这样做的积极意义何在呢？

我們說过，矛盾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动力，在社会主义社会同样如此，它是推动我們的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强大动力。把人民內部矛盾揭露出来，使它引起人們的充分注意，才能找出适当的办法解决它，我們的事业也就前进了一步。关于揭露人民內部矛盾的积极意义，在近几个月以来的“大鳴”、“大放”中已經充分証实了，正如人民日报社論“不平常的春天”这篇文章中所說的：

“由于系統地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針，由于透彻地說明了百家爭鳴、百花齐放的方針，由于在这个基础上开始了党的整风运动，我国的政治生活在过去一个时期内进行得特別活潑起来了。……三个多月的发展，比平常状态下的三年还快；三个多月給予人們的教訓，比平常状态下的三年还丰富。”政治生活的活潑、三个月的时间比三年的发展还快，

就是我們积极地揭露人民内部矛盾所得到的效果。

对人民内部矛盾的揭露，首先使我們能够迅速地发现和糾正我們工作上、思想上、作风上存在的缺点和錯誤。解放八年来，我們的工作有很大的成績，但是也有缺点和錯誤；虽然这些缺点和錯誤的存在是次要的、局部的、暫时的現象，但也不是好东西，必須加以克服，否則，会发展成为長期的、系統的、全面性的錯誤，那就为害严重了。我們的負責同志由于处在领导地位，比較容易看到工作中的基本的、主要的、成績的一面，不容易发现次要的、缺点的一方面；而群众由于所处的地位不同，就比較容易看到缺点、錯誤，因为我們的每一工作都是直接的、間接的和群众的切身利益有关，我們工作中的缺点、錯誤也就必然直接的或間接的影响到群众的切身利益，他們也就對我們工作中的缺点、錯誤的感觉特別敏銳。所以，我們党在彻底貫徹了“大放”、“大鳴”的政策，号召群众揭露矛盾以后，群众把我們工作中的一些很难发现的問題，一下子揭露出来了，一些同志的官僚主义、驕傲自滿、老爷架子等等的毛病，受到了群众的严厉的批評。我們的头腦比較清醒了：“哎呀，我們还有这么些缺点、錯誤！”“群众對我們还有这么些意見！”“再也不能自滿麻痹了！”許多同志过去的作风不好，主动地去向群众檢討；平常不大接近群众的同志，也主动地“下楼”去深入群众。这样一来，不但过去沒有发现的問題发现了、解决了（或正在解决中），而且人們所說的所謂党群之間、領導被領導之間的“牆”、“溝”，也在冲垮和填平了，党群关系、領導被領導的关系更加密切了。如果不是提出“大鳴”、“大放”，群众有意見不能暢所欲言，我們的同志怎么能够这样迅速地发现

和克服自己的缺点、錯誤呢？

党和毛主席从来就教导我們：不要脫离群众，不要自滿，要时时刻刻傾听群众意見，要經常克服缺点、錯誤……可是，有些同志对这些話就是不容易記住，甚至当做耳边风。只有把我們的黨員、干部放在广大群众的監督之下，不但要党来教育、批評，也要发动群众對我們进行批評、教育，这样的“内外夾攻”，缺点、錯誤才比較容易克服。

揭露人民內部矛盾的积极意义，还在于使我們在斗争中受到鍛煉。許多同志一听到“矛盾”，就怕引起意見分歧，因而总是听不得反对意見，这是一种很不好的現象。我們應該認識到，反对意見里是包含着一种积极的因素，它對我們說來，不但不可怕，而且是十分有益。反对意見中那些正确的部分就不用談了，它正是我們所應該接受的；就是那些不正确的部分，對我們也是有好处的。任何反对意見的提出，总是有他的“根据”、“理由”的，这就迫使我們去思考、研究。如果我們把这些所謂“根据”、“理由”一条条据理駁倒了，那么我們的意見就更加正确、更加有說服力，片面性就越少，而且还可以更多的預見到在實現我們这些意見的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困难，这对于我們在工作中尽量减少缺点、錯誤，防止偏差是有很多好处的。正确的东西从来是不怕反对的，“真金不怕火鍊”，真理总是在和錯誤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所以，反对意見是没有什么可怕的，只有那些錯誤的东西才怕反对、怕辯論，因为一辯論就显出了它的原形。因此，一个聪明的領導者，應該如刘少奇同志在“八大”的政治报告中所講的，要：“容許不同观点的无拘束的爭論，以便比較全面地反映客觀事物发展过程中

的各个侧面。”

这里所说的“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各个侧面”，也就是客观矛盾的各个侧面。因此，我们对某种意见，不能完全看做是某人的思想、立场的问题（当然这是事实），还要把它看做是客观矛盾某方面的一种反映；否认这种意见是容易不过的，但不能否认它所反映的客观事物的某个方面，某种意见之所以是错误的，就是因为它是片面的，如果我们把它与整体联系起来加以分析，对我们就有用了。当然，对于那些别有用心恶意的攻击，则是另一回事。

揭露人民内部矛盾的积极意义，不但克服和纠正了党、国家在领导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同时也教育了广大群众，提高了群众的认识水平。有些同志看到自提出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和“大放”、“大鸣”的方针以来，问题更多了，本来没有问题的，也发生了问题，有些人还乘机闹事，因此就怀疑党的政策是否正确，说什么这是“烧香引鬼”，……等等。这种看法是非常错误的。有些问题过去没有发生，不是因为过去不存在什么问题，而是还没有发展到严重的程度，那么现在暴露出来有什么不好呢？例如工人闹事，只要我们深入检查一下，总是和我们领导作风、工资福利等问题上有些缺点、错误分不开的。由于我们党及时提出揭露矛盾，早一点把这些问题暴露出来，只能使我们早一点纠正错误。当然，群众的意见并不是完全对的，甚至有一些坏分子从中捣乱。但这不要紧。正确的意见也好，错误的意见也好，把它都摆出来，经过辩论，群众的模糊的认识会得到澄清，错误的意见会得到纠正，只要错误思想存在而得不到解决，早晚是要爆发的；反而不如让这些错误思

想及早暴露出来,讓群众在辯論中早一点解决它。例如,过去一个时期,要不要合作化,要不要統購統銷,似乎听不到什么人公开反对了,但实际情况并不如此,自“大放”、“大鳴”以来,公开反对或怀疑合作化、統購統銷的声音又出現了。既然如此,就干脆来个辯論,从思想上彻底解决这个問題,事实証明,經過辯論,絕大多數的人走合作化的道路更坚决了,党的政策更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那些造謠污蔑我們的右派分子,在广大群众明辨了是非以后,他們在群众中也就孤立了,群众也就更認清了他們的猙獰面目,这也是好事情。如果我們因为怕“麻煩”,不敢正視矛盾、揭发矛盾,結果不但不能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反而会使小麻煩变成大麻煩,使本来是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变成对抗性的矛盾,那才是真正麻煩了呢。

总之,揭露矛盾對我們來說,它只会使我們克服缺点、錯誤,使我們国家的政治生活生动活潑,推动我們的社会主义事业飞跃的前进。反之,如果对人民内部矛盾不敢承認和揭露,只会造成社会生活的停滯、思想上的僵化,势必使局部的、暫时的錯誤发展成为系統的、長期的錯誤,使社会主义事业受到严重的危害。因此,一个馬克思主义者,决不能害怕矛盾,而是應該勇敢地去揭发矛盾和解决矛盾。

談談“團結——批評——團結”的方針

胡 少 鳴

“團結——批評——團結”这个公式，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增进人民團結的方針，是我們党依据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解决党内矛盾和人民内部是非矛盾的根本方法。

人民内部矛盾不是現在才有，过去有，將來也会有。党和毛澤东同志是一貫重視对人民内部矛盾作正确处理的。早在1929年，毛澤东同志在为紅軍第四軍第九次党代表大会所写的決議——“关于糾正党内的錯誤思想”中，就严肃地分析和批判了当时紅四軍党内所存在着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并提出了以教育为主，增强党的战斗力的克服这些錯誤思想的有效措施，为建党建軍确立了一条正确路綫。可是到了以王明、博古为首的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綫統治全党的时期，这一条正确路綫曾被中断，他們以“殘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宗派主义和机械过火的斗争路綫代替了这一条以教育为主、从團結願望出发的正确路綫。結果造成党内是非不明，死气沉沉，使党内有生力量受到了很大的摧殘，使革命事业受到了严重損失。但是，1935年遵义會議以后，在毛澤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党并没有对以上这些教条主义者采取“惩办主义”的态度，而仍然團結他們，并且耐心地等待和幫助他們从思想上真正認識自己的錯誤。1942年全党展开了整风运动，这是一

次极其深刻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毛澤东同志在“整頓党的作风”的报告中說：“我們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有兩条宗旨是必須注意的：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对以前的錯誤一定要揭发，不講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但是我們揭发錯誤、批判缺点的目的，好象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一个人发了闌尾炎，医生把闌尾割了，这个人就救出来了。任何犯錯誤的人，只要他不諱疾忌医，不固执錯誤，以至于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而是老老实实，真正願意医治，願意改正，我們就要欢迎他，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变为一个好同志。这个工作决不是痛快一时，乱打一頓所能奏效的。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魯莽的态度，必須采用‘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正确有效的方法。”①由于党正确地执行了毛澤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所提出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針，因而使全党的整风运动获得了健康的发展，大大地提高了干部的阶级觉悟，巩固了无产阶级思想在党內外的陣地，使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

1945年4月，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問題的決議”，进一步就正确解决党内矛盾問題作了系統的总结，肯定了毛澤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所提出的“惩前毖

① “毛澤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829—830頁。

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克服党内错误的正确态度的模范”^①。同时指出：“在党的历史上，曾经有过反对陈独秀主义和李立三主义的斗争，这些斗争，是完全必要的。这些斗争的缺点，是没有自觉地作为改造在党内严重存在着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步骤，因而没有在思想上彻底弄清错误的实质及其根源，也没有恰当地指出改正的方法，以致易于重犯错误；同时，又太重了个人的责任，以为对于犯错误的人们一经给以简单的打击，问题就解决了。党在检讨了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错误以后，认为今后进行一切党内思想斗争时，应该避免这种缺点，而坚决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方针。任何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只要他已经了解和开始改正自己的错误，就应该不存成见地欢迎他，团结他为党工作。即使还没有很好地了解和改正错误，但已不坚持错误的同志，也应该以恳切的同志的态度，帮助他去了解和改正错误。”^②“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这一解决党内矛盾的精神，在党在第八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党章以及这次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中，都有了更完备的体现。

党内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的一部分，党在解决党内矛盾的同时，就逐步地发展了一套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措施和政策。如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军执行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改善了军民关系，使军队和人民完全打成一片；同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996页。

② 同上书，第997页。

时在军队内部,又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了上级爱护下级、教育下级和下级自觉服从纪律的正确官兵关系。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正确处理军民、军政之间的关系,解放区内普遍地开展了“拥政爱民,拥军优抗”运动、精兵简政运动和大生产运动,实行了减租减息交租交息政策、劳动政策和经济政策以及在民意机关和政权机关中实行“三三制”,调节了各抗日阶层的利益,解决或缓和了这些阶层之间的矛盾。全国解放以后,对不再抵抗的旧军政人员采取了一律包下来的方针,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了“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对知识分子采取了“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实行了少数民族政策、华侨政策和宗教政策,提出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实行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等等政策。这些都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增进人民内部团结的有效措施。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同志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講演中指出:党在长期革命过程中解决党内矛盾和人民内部是非矛盾所积累起来的经验,曾概括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团结”,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并指出:“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在整个人民内部继续推广和更好地运用这个方法,要求所有的工厂、合作社、商店、学校、机关、团体,总之,6亿人口,都采用这个方法去解决他们内部的矛盾。”因此,正确掌握和学会运用这个“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乃是目前我们每个干部的重大任务。而我们

也只有正确地掌握和学会运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才能把消极力量化为积极力量，从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中的三个环节，是相互关连，相互制约，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第一个团结是愿望，第二个团结是目的，批评或者斗争是使愿望得到实现的手段。

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首先就要有团结的愿望，这个团结的愿望很重要，不论批评者或被批评者，不论领导者或被领导者，不论干部或群众都应该有团结的愿望，如果没有团结的愿望，那就不能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从而也就达不到真正的团结。那末，什么叫做团结的愿望呢？团结的愿望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与人为善，一切都是为了把团结搞好，而不是为了把团结搞坏，一切都是为把社会主义事业搞好，而不是为了把社会主义事业搞坏。只有抱着这种团结的愿望，才能有同志式的实事求是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才能弄清是非增强团结。批评与自我批评虽然是我们事业前进的推动力，是增强团结的要素，但，并不是任何一种批评都可以收到这种效果的。如果我们不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而从主观成见、个人好恶、宗派主义情绪出发，那末一到批评时，就可能成为“残酷斗争”与“无情打击”。要建立团结的愿望，就必须把自己的主观愿望建筑在客观现实的基础上。这就是说：首先要承认人民内部还有矛盾存在，这种矛盾的性质不是阶级利益根本冲突的矛盾，而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划清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才不致用解决敌我矛盾的办法——压服的办法、一棍子打死的方法去解决

人民内部矛盾。其次应该相信在我们的国家里，絕大多数人
是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领导的，同时他們彼此之間的矛盾，也是可以經過說服、教育、批評、討論、協商的方法而求得
解决的。只有確立了这种信念，才不致動搖我們的團結的願望。

一般說来，團結理想相同的人，團結抱負相同的人，團結
战友是比較容易做到的。可是对落后的人，对見解不同的人，
对犯了錯誤的人，特別是对曾經使自己吃過亏的人，講團結的
願望就很不容易了。因此，我們不能一般地来衡量自己是否有
團結的願望，更重要的，还需要在与自己見解不同的人，犯了
錯誤的人，特別是自己吃過亏的人面前，来考驗自己是否真
正有團結的願望，是否以社会主义利益、彼此之間的團結作为
自己的最高利益。

經過批評或者斗争，这是團結公式的中間环节。离开了这
个环节，尽管有好的願望，也不能达到新的更高的基础上的團
結，取消了这个环节就会变成庸俗化。为什么呢？因为是非总
是要經過爭辯才能弄清楚的，沒有批評斗争，不能明辨真理，
不会有共同的語言，因而也就不会有新的更高的基础上的團
結。无原則的團結不仅是不巩固的，而且是有害的。所以批評
斗争是使團結的願望得到實現所不可缺少的手段。

我們在进行批評时，还必须注意批評的态度和方式。虽然
注意开展批評，但批評的态度和方式不正确，也不可能达到新
的團結。那末，什么是正确的态度和方式呢？这就是中共中央
在今年4月发布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中所指出的：既要严
肅認真又要和风細雨。这就是說，我們对于錯誤應該毫不馬虎，

不講情面，进行严肃認真的批評。当然这种批評，又應該是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对于錯誤、缺点既不要夸大，也不要縮小；既要揭发錯誤、缺点，又要肯定成績、优点。因为夸大了錯誤、缺点，既不容易被人接受，又容易損害同志的积极性；縮小錯誤、缺点也不行，无原則的迁就讓步只能助長錯誤、缺点的加深，这对被批評者來說是毫无好处的。有錯誤，有缺点必須揭发，不揭发就不能帮助同志去正視錯誤，也不能促使他去改正錯誤；但，有优点，有成績也必須肯定，否則就会使人喪失改正錯誤的勇气和信心，这对同志对事业來說都是不利的。我們要知道，批評一个同志的錯誤，尤其是思想上政治上的錯誤，这是一件非常細致的思想工作，不是采取狂风暴雨、开斗争大会、一棍子打死的方法所能奏效的。必須采取个别交談、小組座談等民主的和風細雨的方式，秉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进行有效的、与人为善的批評，做到以理服人，不要以力服人。因为一个人的錯誤形成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不仅有社会的根源，而且也有認識上的根源。我們必須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批判，帮助他去找产生錯誤的根源，并根据錯誤的原因提出改正的办法，这样才能使人口服心服，才能真正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同时，我們在批評別人的时候，也不要把自己主观的意見强加在別人头上，應該采取商討、交換意見的方式。因为你的意見即使是对的，也要被批評者通过思考才能加以接受，何況你的意見也可能有不对的地方，因此，應該允許人家声辯解釋，甚至提出反批評，这不能說就是不虛心，或者是品質惡劣。当然有意搪塞故意狡辯那是另外一件事。人家对你的意見有不同的看法，或一时还不易想通，这也

應該允許人家保留自己的意見。有些意見確實是對的，但沒有為被批評者所接受，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仍應耐心等待，堅持說理，不要企圖畢其功於一役，因為思想問題往往不是一次批評就能解決的，思想改造是一個長期的艱苦的任务。此外，批評時還要善于選擇時機和掌握分寸，並且為被批評者準備下樓的梯子，不要使人下不了樓。應該給人家改正錯誤的時間和機會，人家有微小的進步，就要歡迎和鼓勵。

上面只是講到批評者應有的態度，对被批評者來說，對一切善意的批評，即使這種批評有些過火、偏激、片面，甚至有些個人情緒，都應該虛心傾聽，要有“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精神。同時，我們對批評者的意見也不能要求百分之百的正確，因為別人對你的了解總是有它一定的局限性，以被領導同志對領導同志的了解來說，尤其是如此，因而這種要求本身是不現實的，首先我們自己就做不到。因此我們對別人的批評，不論是正確的或者是不正確的，都應該採取虛懷若谷、從善如流的态度。要鼓勵批評，同時又要將批評引向正確的方向。對正確的意見就應該接受，并在實際工作中加以改正。有些意見雖然不完全對，但其中對的一部分仍應接受改正。有些意見雖很好，但目前還不能做到，則應把情況說清楚。有些意見確實是不正確的，也應耐心解釋，有些事情也許一時不容易搞清楚，這也可以留在以後慢慢來解決。總之，不要意氣用事，不要以牙還牙、打擊報復，因為這是與民主、團結的原則相違背的，是對解決人民內部矛盾極為不利的。

有了團結的願望，又有了正確的批評鬥爭，那就有可能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所謂新的基礎上的團結，那就是

在我們思想作风更健康更进步的状态下的团结。但是，我們不能把这种团结理解为完全一致、沒有矛盾了。因为任何事情总是在发展的，旧的矛盾解决了，协调了，团结了，又会产生新的矛盾，新的不协调、不一致。同时人們之間在思想上認識上要完全一致，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个人的社会地位、政治水平、斗争經驗、生活閱历都是各各不相同的。因此，在任何时候也不可能有绝对意义上的团结、一致。团结总是相对的，矛盾斗争是绝对的，如果把新的团结看成绝对的团结，沒有矛盾了，那就永远不会有新的团结。所以我們只能要求在大是大非問題上取得一致的意见，在非原則的、非主要的或个別的問題上，应该允許人家保留意見。也就是說，在巩固共产党的领导，巩固人民民主專政，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可以允許人家在某些具体問題上，有不同的見解和不同的看法。有了这种“求同存异”的精神，才能不断地加强团结，才能达到一次比一次更巩固的团结。

学会正确运用这个“团结——批評——团结”的方針去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并不是一件簡單易举的事情。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理論認識上的問題，而且还包括个人的涵养和經驗等問題。因此，我們应该很好地在这次整风运动中来加强这方面的鍛煉，在整风运动的實踐中积累經驗，学会这一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方法。而这次整风运动的目的，就是为了学会掌握这个“团结——批評——团结”的方針，去克服我們在实际工作中的錯誤和缺点，提高我們的認識，改造我們的思想作风，来保証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解决，从而促进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的順利发展。

关于人民内部矛盾和反右派斗争

陈 原

我国在经济战线上(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疾风暴雨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今后,我们的目标,是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为此,中国共产党陆续提出了一系列的重要的政策。1957年2月27日,毛主席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就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系统地、更加透彻地阐明当前形势、我国所面临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以及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等各项政策的一篇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献。毛主席作了这篇讲演后不久,我们党鉴于要能够进一步地更好地领导全社会的改造和新社会的建设,还必需同时改造党的自身,整顿党的作风,因而于1957年4月27日,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采取开门整风的办法,开始了党的历史上第二次的伟大的整风运动。

所有这一切，又一次显示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后的光辉：国内的政治生活，空前地生动活泼起来了。从党中央和中央各部，到各省市党委和各个系统、各个团体、机关、学校、工厂、企业的党组织，都放手开展和听取群众的批评。各方面的人士和各界群众，怀着爱党、爱社会主义、爱国的深厚感情，在座谈会上，报章杂志上，黑板报上以至大字报上，提意见，发议论，畅所欲言地向共产党，向人民政府，提出了大量积极的、有时是十分尖锐的批评；有些共产党员思想作风方面的许多严重缺点，受到公开的不容情的揭露，登上了黑板报、大字报。在我们党发扬民主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种史无前例的群众性的批评运动中，绝大多数人的意见，是诚恳的，是基本上正确的。自然，也有少数意见、观点不太正确，有的人态度过于偏激，有些事实不尽确实。但就是这一些，也属于逆耳苦口的善意的批评，虽不是个人觉得好受，但对党也很有益。上述情况大大推动了党的工作的改善，大大加强了党同广大群众的联系和团结。这正是我们党的群众路线的最生动的体现。

但是，国内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对此却另有看法和做法。资产阶级右派，对于社会主义原是怀着刻骨仇恨的，他们认为共产党总有一天是要垮台的。什么拥护人民民主专政，拥护人民政府，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对于资产阶级右派说来，本来都是欺人的谎言。他们错误地估计了我国当前的政治形势，他们以为毛主席提出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等各项政策，是受到斯大林事件、波匈事件等影响和在群众的压力

之下的产物。善良的人们热忱地帮助共产党整风，也使右派们头晕目眩，在他们看来，简直大家都在反对党。从这种荒诞的估计出发，他们以为中国晴朗的天要变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到了。他们从深水里浮了上来，混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善良的人们中间，“誓师”向共产党，向社会主义大举进攻了。这一小撮豺狼，看来神通确乎不小。他们“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大鸣大放”只许讲缺点错误，“把象鼻子说成竹筒子也可以”，就是不准讲优点成绩；企图抹杀党的辉煌功绩，丑化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孤立共产党。一个时期，中国天空上忽而黑云乱翻。

显然，事情是起了变化。当时已经存在着两种性质不同的运动和斗争了。一种是，旨在消除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等错误和缺点，以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改进作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党的整风运动。很多人批评共产党的缺点，是要共产党改。另一种是，资产阶级右派利用党的整风挑动起来的政治上思想上的一场阶级斗争。目的是要推翻共产党，使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资产阶级右派既然决心要同共产党和工人阶级作一番较量，向我们开火，我们不能不起而应战。

在风浪里成长、从烈火中锻炼出来的我们的党，从来认为，不经过风浪的船夫，锻炼不成干练的舵手；不经历种种困难和艰险，不算是坚强的战士。群众的革命觉悟，在斗争的风暴里才能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不应该象在温室中培养花朵一样。因此，党决定，为了争取这一仗的全胜，在战斗的初期，一切整风的机关、学校的党组织，一切党报，对于资产

階級右派的猖狂進攻，採取硬起頭皮、只聽不駁，聚精會神、分析研究的態度。目的是讓魑魅魍魎、牛鬼蛇神肆無忌憚地登上舞台，好讓群眾認識他們的真面目，增長知識，進而聚集力量，等待時機成熟，以便實行反擊，徹底孤立這些丑類。

這樣，右派就更加得意忘形了。他們以為黨團組織瓦解了，共產黨已無能為力，非要請他們出馬來“收拾殘局”不可了。他們頭腦發熱，在各種場合，座談會上，在當時的光明日報、文匯報等這類報紙上，刊物上，……毒草大長特長；他們一步步深入地攤開了他們的反動綱領：反對社會主義。他們污蔑五大運動，三大改造是“糟糕透頂”“得不償失”，企圖對已經基本完成的社會主義革命來一個倒算，來一個翻案。他們反對共產黨的領導，說黨的領導是“宗派主義的根源，”是“一黨專政”，是“黨天下”；叫囂黨應退出文化教育界，退出科學界，退出機關、團體、工廠企業……，來一個“輪流執政”，搞一個什麼“政治設計院”等等。他們反對人民民主專政。高唱“絕對民主”的濫調來迷惑一部分人，以便為反革命復辟打開通道。他們反對我國的外交政策。散布反動的民族主義思想，煽動群眾，向偉大的盟邦蘇聯潑污水，企圖破壞世界和平支柱的中蘇之間的團結。總之，資產階級右派猖狂到了頂點，正象喝了雄黃酒，一切偽裝都卸了下來，原形畢露。

“物極必反”，凡是右派，都不懂得這樣的辯證法。過高估計了自己，過低估計了人民，又是他們的通病。當他們反共反社會主義的丑惡原形一旦顯露於光天化日之下，就是那些被迷惑過幾個月、幾個星期的一小部分好心人，也恍然大悟，眼睛亮了：什麼幫助黨整風，真正是一場騙局！工人、農民等勞動

人民和革命知識分子就更不要說了。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這次資產階級右派發起的猖狂進攻，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一場激戰，是中國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又一次的激戰。如果這一仗不打勝，不把資產階級右派這一豺狼集團的脊骨打斷，社會主義是沒有希望的，讓右派陰謀得逞，就將是中國民族的絕大災難，就將使千百万人民的人頭落地。因此，當1957年6月8日我們黨在人民日報上發出向右派反攻的信號以後，資產階級右派立刻發現：被孤立的並不是共產黨，恰恰是右派先生們自己。在右派分子的面目被揭發和暴露以後，他們已處於“老鼠過街，人人喊打”的境地了。

二

人們問：在上述不平常的複雜的情況下出現的這場階級鬥爭，不能避免嗎？對於資產階級右派大張撻伐展開反擊，確是必要嗎？回答是：這一場決鬥，不僅是資產階級右派挑動起來的；而且，這也原是不可避免的，是絕對必要的。

這是因為，我國雖然已經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剝削階級已經基本消滅，革命時期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鬥爭已基本結束，但這決不是說，社會主義社會里就不再有階級鬥爭了。即使在人民內部矛盾中，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的矛盾，還有對抗性的一面，還存在着嚴重的階級鬥爭。在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在社會大變革的時代，社會政治力量不斷地重新配置和發生變化。這種變化，在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中，表現得特別強烈和尖銳。其中有一部分人，他們不占多數，是擁護共產黨和工人階級的領導，擁護社會主義，

願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这是进步分子，屬於左派。另一部分人，他們占絕大多數，是愛國的，要社会主义的，要党和工人階級的領導的，并不太勉强地接受了社会主义改造，但是，他們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某些方面，暫時还不习惯，还有怀疑、动摇和保留。这屬於中間派。还有一部分人，这就是右派，也就是資產階級中的反动派、反革命派。他們是坚决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他們不甘心剝削制度的灭亡，夢想走資本主义道路，并一心一意为此作最后掙扎。这批人，人数虽极少，却有财产，有知識，有能力，同国内外反动派有千絲万縷的联系，有进行政治斗争的甚至是武裝斗争的經驗，而且在有几个民主党派中，他們还是“当权派”。这一小撮人，同共产党和工人階級的合作是形式上的，实际上不合作；或者有些事合作，有些事不合作。他們虽置身于人民的队伍之中，但是站在反对社会主义的立場上，一遇空子就鑽（例如这次党的整风运动，他們以为是空子，就猖狂进攻了）。因此，階級斗争一直存在，而且是長期的。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的講演中，就指出：“无产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斗争，无产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态方面的階級斗争，还是長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之間誰胜誰負的問題还没有真正解决。”可見，資產階級右派挑起这一場斗争，原不足怪。

此外，还因为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用和平的方法来实现的。在我們 6 亿人口的大国中，經歷这样一个深刻的革命

而沒有引起經濟上、社會秩序方面的大波動，並且順利地飛躍地發展了經濟和文化建設，這對於我們全國人民來說，當然很有利。但是，正因為社會主義革命是和平進行的，又是在短短的六、七年之內很快完成的，社會主義革命事業，究竟有多大成績；民主革命勝利以後，是走社會主義道路，抑或走資本主義道路；是接受共產黨和工人階級的領導，抑或接受資產階級的領導；是人民民主專政、民主集中制，抑或是“絕對民主”“兩院制”“多黨制”；是聯合蘇聯，向社會主義陣營一邊倒呢，還是走反動的民族主義的道路；這一系列的根問題，都沒有認真地徹底地辯論過。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在鑼鼓、爆竹、歡呼聲中也迎了新，送了舊，在經濟上雖然過了社會主義這一關，但是在政治上思想上還沒有過這一關。“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帝國主義所有制，封建主義所有制，官僚資本主義所有制，民族資本主義所有制，小生產者所有制這五張“皮”都沒有了，“王荊大夫”做不成了，可是他們又不甘心或不習慣、不樂意附在工人階級、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這張新皮上。這樣，就使得資產階級右派覺得他們的思想還有市場，因而敢於翹起尾巴，假借幫助黨整風，發動這場猖狂進攻。

由此可見，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走社會主義道路的這場惡戰，是不可避免的。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在經濟戰綫上（所有制方面）已經取得了基本勝利，但單有這方面的勝利是不夠的，並且是不巩固的。還必須要有政治戰綫上的和思想戰綫上的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經歷了 11 年艱辛建設之後發生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証明。我們放手讓右派“大放大鳴”和展開反對右派的鬥爭，實質上，就是在政治戰綫上和思想戰綫

上的一次偉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同时，也是一場要解决关于革命是否正确，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不要共产党的领导，要不要人民民主專政以及我国外交政策是否正确等根本問題的大辯論。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从清朝末年起，經過辛亥革命，反袁世凱，到北伐战争，抗日战争，是經過了几十年的反复的辯論的，有充分的精神准备。社会主义革命，它比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深刻复杂何止几倍，它影响着 6 亿人民的生活、思想和傳統习惯，需要有这一場全民性的大辯論，不仅十分必要而且也是很自然的。

事实上，我們同資產階級右派在这一系列关系国家存亡的根本問題上的斗争，也已经有多年的历史。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每一进展中，几乎都遇到过資產階級右派的广泛而激烈的反抗。大家都可以記得，在制定宪法的时候，他們发出过要保持共同綱領——既有社会主义，又有資本主义的謬論；1953 年宣布总路綫的时候，他們提出过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口号，散布过所謂“工人与农民的生活，是九天九地之差”的謬論；在制定第一个五年計劃的时候，他們就反对过工业化，发出过“由国家經營重工业，資本家經營輕工业”来一个所謂“分工”的謬論；在农业合作化飞跃发展和实行統購統銷的时候，他們也曾放出过“糟得很”“农民沒飯吃”的謠风……。所有这些斗争，只不过沒有象今天这样瘋狂，这样露骨，这样有組織、有綱領、有計劃而已。爭論既然存在，而且又是在一系列根本問題上的、不能含混的爭論，那么，迴避這場斗争，并不能幫助我們平稳地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只有因势利导，公开地进行這場斗争，彻底击垮右派，駁倒他們的一切謬論，夺取

這場大辯論的全勝，才能大大促進我國人民的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推動歷史前進。

三

前面說過，反擊資產階級右派的鬥爭，是一場“破資本主義，立社會主義”的尖銳的、複雜的階級鬥爭，是政治戰綫上和思想戰綫上的一次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它關係着國家民族的生死存亡。

既然是一場政治鬥爭，就來不得溫情主義。

有人問：黨不是在要別人幫助整風嗎？不是說要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嗎？現在反擊右派，說是一場階級鬥爭，不是“言者有罪”了嗎？

不錯，共產黨還要繼續請廣大群眾幫助整風，整風運動必須繼續進行，黨堅決要同黨內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的資產階級思想和作風展開鬥爭，使人民內部的矛盾得到不斷的解決。但是，右派是在幫助黨整風嗎？當然不是。他們的方針，就是要整垮共產黨，革人民的命，造成天下大亂，好讓他們建立起一個資產階級的王朝。如果對於右派這些陰險毒辣的反動言行，仍然溫柔多情，試問，這對人民革命事業還有什麼責任心？

不錯，我們是主張“言者無罪”的。但是對於右派，這一條不適用。他們不但有言論，而且有行動，他們是有罪的。在我國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資產階級右派，就是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反動派，反革命派。他們和人民之間的矛盾是一種對抗性的敵我之間的矛盾。那麼，是不是要把右

派分子当作反革命来办罪呢？现在看来，可以不必。因为一则我们的国家很巩固，当他们的丑恶嘴脸彻底暴露以后，当广大人民都闻到了他们的臭气以后，保存这一小撮人，让他们当“教员”，对我们没有什么害处。再则，右派一旦孤立，他们本身就会发生变化。我们向右派展开反击，就可能使右派分子经过外力的推动和自己的悔悟，低头认罪，改邪归正。因此，我们可以宽大为怀，不仅不办罪，也可以不叫他们反动派，一般叫他们是“右派分子”就可以了。对他们也还可以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原则。但对那些坚持反动立场，抗拒改造，继续采取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动的右派分子，就不同了，他们自绝于人民，人民就要办他们的罪。至于右派中还有一部分人，他们有言论但无破坏性行动，那当然更可以宽大一些。但是，如果把对右派分子的宽大，理解为可以对反右派斗争手软心酸，则是完全错误的。

既然是一场思想斗争，也来不得简单粗暴。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右派，他们对社会主义不心服，对共产党不心服，决心要较量一下，因而借口帮助党整风，挑起了这一场急风暴雨式的斗争。他们的反动言行，激起了众怒，人们报之以严厉的反击，这也是很自然的。不给他们这样的反击，他们便不能低下头来。但是，这一场决斗，是关系到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等一系列根本问题的一场大辩论，这个斗争就不能不是长期的，不是几个月而是几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深入的斗争。因此，不能简单从事，草率收兵。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講演中說：“思想斗争同其他的斗争不同，它不能采取粗暴的强制的方法，只能用细致的講

理的方法。”我們跟右派作斗争，就是用的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这也就是说，对右派的斗争，要求对右派进行充分的揭露和彻底的批判。而批判需要依靠有分析的、有说服力的、经得起反驳的说理；揭露需要依靠证据确凿的、经得起检查的事实。只有这样，我們才能在反击右派的斗争中，帮助群众分清真假、善恶和美丑，真正达到团结和教育最大多数而击败少数右派分子，夺取这场大辩论的全胜的目的。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怎样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作者 = 周原冰等著

页数 = 64

SS号 = 10910561

出版日期 = 1957年11月第1版

前言

目录

两类社会矛盾的区别下转化 周原冰

人民内部矛盾在我国当前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根本原因 凌雨轩

谈人民内部矛盾的长性和今天强调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性 雪之

正视和揭露人民内部矛盾的积极意义 马梭芝

谈谈“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 胡少鸣

关于人民内部矛盾和反右派 陈原